

# 比较

Comparative Studies

吴敬琏 主编

23

改革是资源配置制度的整体跃迁  
楼继伟

中美个人收入的变动性比较  
尼妮·郭 约翰·潘卡维

评《中美个人收入的变动性比较》  
李实 白重恩 张春霖

目标与过程  
钱颖一

公平何处求  
张春霖

从国际市场视角看中国经济发展  
黄海洲

规范和法律在经济学中的作用  
考希克·巴苏

证券法中什么在起作用  
安德烈·施莱弗

贫富的逆转  
达龙·阿西莫格鲁 西蒙·约翰逊 詹姆斯·赫克曼

人民币汇率陷阱  
罗纳德·麦金农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 比较

*Comparative Studies*

吴敬琏 主编

23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比较. 23 / 吴敬琏主编.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6.3

ISBN 7-5086-0595-0

I. 比… II. 吴… III. 比较经济学 IV. F0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012726号

---

**比较·第二十三辑**

**主 编:** 吴敬琏

**责任编辑:** 肖 梦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14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6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86-0595-0/F·999

**定 价:** 20.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服务热线: 010-85322521

<http://www.publish.citic.com>

010-85322522

E-mail: [sales@citicpub.com](mailto: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mailto:author@citicpub.com)

# 卷首语

中国经济改革自1978年开始，已经走过了四分之一一个世纪。如何总结过去，面对挑战？主编吴敬琏教授不久前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指出，“目前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的确面临着崭新的阶段，需要对过去进行认真的反思，对未来进行慎重细致的规划。在这个时刻，每个经济学家都有责任为这种反思和规划提供自己专业性的思考。”

楼继伟的《改革是资源配置制度的整体跃迁：关于中俄改革与发展的比较》虽然是一次国际会议上的发言，却呼应了主编对经济学家提出的要求。文章比较了中国与俄罗斯的改革策略，回顾了中国改革的轨迹：从整体上一直是市场导向的，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期以及以后的理论，一直是指导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思想基础，而直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才最终真正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而且，中国的改革一直把制度建设作为重点，同时，讲求实事求是，吸收外来成功经验和理论，根据中国特点寻找自己的道路。中国的改革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实际上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作者总结说，中国经济改革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整体跃迁，采取的改革策略是波浪式前进。

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楼继伟罗列了许多，就国内舆论来说，最受人关注的是“公平”问题，而其中又以“收入差距”最为舆论所热络。正因为收入不均问题是值得关注的大问题，对收入不均现象的深入理解是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前提，编委钱颖一教授向《比较》推荐了一篇有关“收入变动性”（income mobility）的文章，妮妮·郭与约翰·潘卡维两位斯坦福学者的文章——《中美个人收入的变动性比较》。他们利用1996年进行的“中国家庭收入研究项目”所获得的数据进行了细致的经验分析，研究我国个人收入的变动性，来考察人们从一个收入阶层迁移到其他收入阶层的可能性，并与美国的情况进行了比较。编者请研究中国收入分配领域的著名学者李实对这篇正是

根据他的研究项目的数据而成的文章作了短评。同时请白重恩和编委张春霖对文章各作了一篇引介。他们指出，“机会不均有多严重以及收入不均是否会持续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基于可靠的具有统计意义的证据，而不是基于主观印象，或者是基于一些不具统计意义的案例。两位斯坦福学者的研究工作为我们回答这两个问题开了一个好头。”收入变动性这个概念的意义就在于它是对收入不均等指数的一种补充。它主要描述的就是在一定时期（例如5年、10年或20年）中原来处于某一收入分配阶层的人们向更高或更低收入阶层移动的可能性。有两点是肯定的，第一，分析中国的收入不均等问题不能仅仅看一个年度的不均等指数，还必须看收入的变动性；第二，现有证据表明，至少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中国的收入变动性可能高于美国而且是在上升的。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1981~2001年的20年期间，中国有4亿原来生活在国际贫困线（每天消费低于1美元购买力平价）之下的人口脱离了贫困。由此看来，本文的结论很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实际情况。

《财经》杂志最近一期的封面标题就是“中国2006反思之年”，其中一些短小精悍的文章都对中国的改革做了反思与总结。其实，对改革的反思并不是始于今天，也不是这两年才警醒的，我们有许多文章在那里“立此存照”。本辑《比较》以“历史文本”为栏目，重发钱颖一1998年的《目标与过程》，是可以让读者温故而知新，也可以算是对开篇的文章做一个补充。

在“改革论坛”栏目我们提供了两篇文章，一是编委张春霖的《公平何处求：“质疑改革年”过后的思考》，文章针对2005年处在质疑声浪中心的几个问题，特别是关于“社会公平”所遭遇的严峻挑战，做出了反思与回答。文章首先分析“公平”的多种具体含义、公平的价值和促进公平的机制，然后就如何应对当前中国改革中遇到的社会公平方面的挑战提出一些个人看法，以期有助于理清思路、增进共识。作者认为，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今天的中国在社会公平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并不是由于我们在引入市场机制、私人产权方面做得太多，而是由于公共治理的改革没有取得足够进展，以致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因此，只有继续坚定不移地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方向，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如此，则公平、效率有希望兼得。反之，如果试图以抑制甚至再次消灭市场机制和私人产权来追求公平，其结果必定是公平、效率皆亡。

二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黄海洲的《从国际市场视角看中国经

济发展》。文章指出，从国际市场视角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新的国际环境和挑战，需要对国际经济形势和风险有一个深入的研究和认识。中国面临怎样的国际环境？全球失衡问题有多严重？中国面临多大的石油、粮食和原材料价格风险？本文认为，全球失衡问题存在但不严重，中国将长期面临石油、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在外的问題，而原材料问题更为突出但可解。关键是在全球化下有效利用全球自然资源和市场，这要求中国必须进一步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迅速解决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间的不匹配和不相容这一日益突出的矛盾。尤其在金融领域要大力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包括外汇和商品期货市场，并争取尽快确立中国在世界原材料期货市场中的定价中心地位。

“法和经济学”栏目为读者提供了两篇重要学者的文章。康奈尔大学经济系的印度裔经济学家考希克·巴苏教授，在政治经济学、法和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等诸多领域都有丰硕的研究成果。他提出的有关法律和社会规范的“核心定理”在学术界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规范和法律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一项政治经济学研究》正是对这一“核心定理”的集中表述。巴苏说，在现实生活中，那些为政府工作的人——诸如警察、地区法官、税务官、政府行政官员、污染控制部门的官员——也同样怀揣着自己的动机、自己的梦想、自己的奋斗目标以及自己不便告人的小算盘。而经济学家们对研究政府着力太少，政府通常被看做是一个外生的机构。政府也是博弈的局中人，这在研究经济学和政府的最新文献中已经得到了承认。作者指出，写在纸上的法律条文，能创造人们心中对其他人会如何行事的预期，它能创造聚焦点，因此就能影响博弈结果。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同样会出现类似的情况。草率制定的法律，即法律制定时没有充分考虑个人动机，就有可能对人们的行为不产生影响，或者法律实施制造了混乱而带来了不合意的影响。为了避免这样的草率立法，我们首先就必须了解：法律是如何起作用的，在什么情况下起作用。文章以一则故事开头，生动有趣。

《比较》发表过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安德烈·施莱弗的不少文章，本辑《证券法中什么在起作用？》是施莱弗教授对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在研究的法和金融领域的一个简要概括。文章认为，证券法之所以起作用，不是因为证券法提供了公共执法，而是因为证券法通过广泛的信息披露要求和便利投资者请求损害赔偿的责任标准，以便利私人缔约。这一研究结果的意义在于，不是笼统地说证券监管是否重要，而是指出了有效证券监管的方向。通过相关讨论，特别是

实证研究，对于厘定证券监管的边界是非常有帮助的。

“前沿”栏目中的《贫富的逆转：现代世界贫富格局中地理和制度的作用》一文，是一篇被引用和讨论得非常多的重要文献。人们对“国富国穷”的原因始终抱持着浓厚兴趣。与古代中国的辉煌相似，在几个世纪之前，印度的莫卧尔、美洲的阿兹特克和安第斯也曾属于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然而今天，这些地方普遍为贫困所累，而北美洲、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过去极不发达的地区却变得富裕起来。世界范围的贫富分布格局发生了逆转。三位著名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以及詹姆斯·鲁滨逊合作研究了这一现象。作者借助大量历史数据，通过回归分析证明，16世纪以来的贫富逆转是由欧洲殖民主义所带来的制度因素造成的，欧洲人制造了一种“制度安排的颠倒”，在原来比较贫穷的地区引进了鼓励投资的“私有财产制度”，而在原来比较繁荣的地区却采取了“掠夺制度”。作者指出：掠夺制度将使大多数人民面临被政府、统治阶层及其代理人剥削和控制的危险。而私有财产制度首先是可以保证财产权利的安全，使那些发现了创新机会的人可望从自己的投资中获得回报，从而产生投资的激励；其次，该制度应该适用于“社会各阶层”。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只有极少部分人（例如大地主）掌握着全部财富和政治权力，即使这些少数精英人士的财产权利是安全的，但依然没有理想的投资环境。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这种制度化的颠倒终于导致了各地区增长速度的巨大差异和相对贫富的逆转。文章还强调，上述的贫富逆转现象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得以检验诸多关于长期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的理论，特别是影响最大的“地理因素假说”。

斯坦福大学的罗纳德·麦金农教授再次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发表了他坚持一贯的看法，并殷切地希望《比较》能够传达他的意见和建议，作为“海外特稿”，《人民币汇率陷阱：重蹈日本覆辙？》一文继续强调了观点：在美元本位下，对像中国一样有经常项目盈余的债权国来说，向它们施加重商主义压力，迫使其货币升值，或让汇率更为“灵活”都是错误的。仅是对汇率持续且不确定的升值预期就会干扰以工资增长调节生产率增长的自然平衡，从而恶化中国所面临的潜在通缩问题。此外，升值预期还会导致金融市场出现零利率流动性陷阱，从而使央行在面对未来实际货币升值所导致的通货紧缩时束手无策——就像日本早先的经验一样。

# 目 录

## Contents

### 第二十三辑

- 1 改革是资源配置制度的整体跃迁：关于中俄改革与发展的比较 楼继伟  
Reflection on China's Economic Reform *by Lou Jiwei*

### 转轨与比较研究 **Transition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 9 为深入研究收入不均问题开个好头 白重恩  
Comments on Income Mobility of Individuals in China and the U. S.  
*by Bai Chong-En*
- 11 认识中国的收入变动性 张春霖  
Comments on Income Mobility of Individuals in China and the U. S.  
*by Zhang Chunlin*
- 15 中美个人收入的变动性比较 尼妮·郭 约翰·潘卡维  
Income Mobility of Individuals in China and the U. S.  
*by Niny Khor and John Pencavel*
- 54 如何看待个人收入的变动性：点评《中美个人收入的变动性比较》一文  
李 实  
Comments on Income Mobility of Individuals in China and the U. S.  
*by Li Shi*



## 历史文本

Historical Text

- 59 目标与过程 钱颖一  
The Destination and Process *by Qian Yingyi*

## 改革论坛

Reform Forum

- 69 公平何处求：“质疑改革年”过后的思考 张春霖  
Equity Issues in China's Economic Reform *by Zhang Chunlin*
- 87 从国际市场视角看中国经济发展 黄海洲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Global Economy *by Huang Haizhou*

## 法和经济学

Law and Economics

- 95 规范和法律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一项政治经济学研究 考希克·巴苏  
The Role of Norms and Law in Economics: An Essay on Political Economy  
*by Kaushik Basu*
- 118 证券法中什么在起作用？ 安德烈·施莱弗  
What Works in the Security Laws? *by Andrei Shleifer*

## 前 沿

Guide

- 149 贫富的逆转：现代世界贫富格局中地理和制度的作用  
达龙·阿西莫格鲁 西蒙·约翰逊 詹姆斯·鲁滨逊  
Reversal of Fortune: 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by Daron Acemoglu,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

## 海外特稿

Special Contribution

- 183 人民币汇率陷阱：重蹈日本覆辙？ 罗纳德·麦金农  
China's Exchange Rate Trap: Japan Redux? *by Ronald McKinnon*

# 改革是资源配置制度的 整体跃迁

## 关于中俄改革与发展的比较

楼继伟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中俄改革与发展的比较。一般认为，俄罗斯改革遵循的是华盛顿共识，比较激进、非常集中地推行了强有力的改革措施，但是在比较长的时间内效果并不是很理想，造成较长时间的衰退和通货膨胀，以及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寡头垄断，甚至出现国家分裂的趋势。经过近几年对经济改革中一些缺陷的修补，俄罗斯经济已经出现了恢复性的平稳增长，可以说是在经过痛苦的调整之后出现了持续性的发展势头。

我对俄罗斯情况了解并不是很多，只有一些表观性的了解，缺乏全面的研究，所以难以做出深刻的比较。我主要讲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同时就了解到的俄罗斯的一些现象，作些局部的比较。

### 一、华盛顿共识与改革策略

经济学基本原理认为，市场经济运行需要三个核心要点，即宏观经济稳定、

---

\* 本文是作者在2005年12月17日于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等单位主办的“中国和俄罗斯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以及针对与会俄方学者提问所作的回答，根据录音整理而成。——编者注

市场化和对外开放。针对转轨经济的“华盛顿共识”是一种改革策略，认为三个核心要点互为因果，必须“三位一体”，集中进行改革；国有企业一统天下的原体制，压制了经济自由，财政负担沉重，无法实现市场化 and 经济稳定，必须快速私有化。与俄罗斯转轨模式相比较，中国没有硬套华盛顿共识的改革策略，而是走了自己的成功之路。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由斯蒂格利茨发起了对“华盛顿共识”的批判<sup>①</sup>，中国道路取得成功的看法开始逐渐得到某些国际认同<sup>②</sup>。但是，对那种认为“中国改革策略不是大爆炸，不是激进改革，而是渐进式的改革，因此取得了成绩”的观点，我觉得也不是很准确。我曾经讲过，改革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整体跃迁，中国采取的改革策略是波浪式前进<sup>③</sup>。当然，这都是一些表观性的表述，并不是经典的经济学或者转轨经济学的语言，如何表述得准确十分困难，也没有共同的认识。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实际上运用了现代经济学各方面的新成果，并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地方。

华盛顿共识并不全错，它包含了一些经济学家普遍接受的经济学基本原理。

---

<sup>①</sup> 斯蒂格利茨在1998年1月赫尔辛基召开的WIDER会议上发表了“更多的政策工具和更广泛的目标：走向后华盛顿共识”的演讲，他说：“我想在这里讨论的是，我们对经济发展的理解有了提高，特别是‘后华盛顿共识’的兴起。我的评论将详细阐述两个主题。第一，我们对市场良好运行的因素是什么有了更好的理解。华盛顿共识认为，良好的经济绩效需要三个条件：贸易自由化、宏观经济稳定、把价格搞对（参见Williamson, 1990）。一旦政府解决了这些问题，私人市场就可以有效率地配置资源，带来强劲的经济增长。当然，所有这些都对市场良好运行来说都是重要的……但是，华盛顿共识提出的策略是不完善的，这些政策有时还会误导人。让市场有效运行不仅需要低的通货膨胀率，还需要合理的金融监管、竞争政策，以及有利于技术转让和鼓励透明度的政策，华盛顿共识忽略了一些基本的问题。我们对促进市场有效运行的政策工具也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我们已经拓展了发展的目标，使其包含其他目标，如可持续发展、平等发展和民主发展。对当今的发展来说，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探索互补性的策略来同时实现这些目标。在探索这些政策时，我们不应该忽略必然会出现的权衡取舍。这是我要讨论的第二个主题。”英文全文可从网上下载More Instruments and Broader Goals: Moving Toward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编者注

<sup>②</sup> 对于转轨策略的比较分析和讨论，自90年代初即在国际经济学界展开，到90年代后半期，对俄罗斯的“大爆炸”、“休克疗法”以及“无偿奉送私有化”等的批评的声音也逐渐被介绍到中国。参见1997~1999年发表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的若干篇文章，中信出版社《比较》中有关转轨的若干文章，以及热若尔·罗兰的《转型与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梁晶工作室），2002年版]，对这一讨论过程有详细的描述。

<sup>③</sup> 详见楼继伟著《中国改革：波浪式前进》，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年版。

同时华盛顿共识也有很多问题。它没有包括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一些重要方面，比如说制度的建立，也没有体现出改革的过程与速度的重要性，特别是私有化的过程。一个忽略诸多重要因素的改革策略，付诸实践就可能出问题。我们必须考虑起始的条件，即所谓起点。比如，新古典（Neoclassical）经济学假定信息无成本，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是现实需要、实际存在的成本。我们要考虑如何通过制度重建来降低信息成本，还要考虑这个制度重建所需的时间跨度，而这显然不是一个大爆炸式的时间所能解决的。简单地照搬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是个灾难，会出现资源的误配置、财富被掠夺和宏观经济无法稳定。因为从起点上看，不存在大幅度降低信息成本的制度，也不可能短期内构建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制度性条件。

然而，批判“华盛顿共识”，并不是说其精髓——以市场配置资源和宏观稳定就错了，可以中国为例，说明“华盛顿共识”中所包含的一些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有普遍适用意义的：

第一，中国的宏观经济比较稳定，财政政策一直比较谨慎。近十几年来，中国经济有两次比较大的波动。一次是1993~1996年的经济过热，另一次是1998~2002年出现的通货紧缩趋势。我们通过采取适当的宏观政策，沉着应对。第一次是实行财政和货币“双紧”政策，解决了高通货膨胀。1998~2002年的通货紧缩，主要是来自于外部冲击，1998年是因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持续到2001年的时候又遇到全球性的经济衰退，通过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中性略为偏松的货币政策，我们又解决了通货紧缩的趋势。目前经济偏热，我们相信有以往的经验，能解决好这个问题。

第二，市场化取得长足的进展。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减少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控制，这是必然的，这包括让个人自主决策产品的价格、品种和数量，以及降低国有资本比重，至于是不是一定要快速私有化，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不一定要通过这个途径。我们以国有经济比重为表征，比较一下国家直接控制经济的情况。在改革开始的1978年，国有资本比重大致在70%左右。此外，生产者的价格、产品的品种和数量都是由国家来确定的，这种经济控制比国家对资本控制的范围还要广、程度还要高。考虑这一因素，当时国有经济的比重可能达到90%。现在其实也就只占30%左右，这可以从国民经济的三大产业来做具体分析。首先是农业，按其价格、品种和数量控制三个方面综合起来考量，可以

说农业不是国有的，是由农民来自主决定的，包括土地如何使用。当然，土地改作其他商业性用途需要经过批准，要作价值补偿，这在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都是这么做的。其次是工业，这个产业中的国有比重不足50%，大体是在40%~50%之间，国家直接管理的主要集中在能源、军工和一些设备制造行业的一些关键性企业。再从服务业方面看，国家直接控制的主要是金融、通信以及骨干交通，其余的不能说是以国有企业为主。目前，即便是国有企业，也已经不是原来计划经济时的国有企业，而是已经公司化，有些已经上市，它们的股权多元化了，同其他企业一样，对产品的品种、数量、价格有完全的决策权。不过，垄断性行业价格决策还主要集中在国家。我们将这三个产业的国有比重再用三个产业占GDP的比重加权计算，总的国有比例也就30%左右。相对于一些东欧转轨国家、亚洲转轨国家，甚至于某些欧盟国家来说，这一比例都不算高。

第三，中国的经济是开放的，我们一直是走对外开放的路。中国已经全面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通行的市场经济规则越来越多地成为中国经济的组成部分；中国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全球资源配置。特别是在加入WTO以来，国际社会都认为中国基本履行了加入WTO的承诺，中国对外的开放度是不断提高的。

从以上宏观经济稳定、市场化和对外开放这三条来看，实际上“华盛顿共识”所包含的一些经济学基本原理也在中国的改革中起了作用，也是取得成功的基本因素。

## 二、整体跃迁与制度转换

相对俄罗斯而言，中国改革之所以能比较成功，主要是改革比较多地考虑了从一个形态转向另一个目标形态的整体跃迁，以及实现这种制度性转换所需要的时间，这个时间不是一代人能够解决的。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需要包括社会意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多方面的制度转换，其根本还在于资源配置方式的转换。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最大区别是社会经济的决策模式，需要从中央计划转换到个人（企业也是个人）自主性决策，这是最大的制度变化。

新的经济决策模式的正常运行，需要相应的制度作保证。制度建设有很多内容，首先是基于经济自由决策下的一些游戏规则，如合同制度、会计制度、法律制度等。其次，还有定价机制，包括一般产品市场定价和自然资源定价、自然资源价值的评估等。这在计划经济下不需要讲，但在市场经济下则是必须的。此外，金融服务以及对金融资产风险的控制，还有整个社会最后的安全网：社会保障体系等，这一系列都是制度。

这些制度的运行又必须以国家行政能力作为支撑条件。首先，那些合同、会计、法律、金融的监管等，是对基于自由经济决策的游戏规则的维护，这显然是政府的职能。其次是基于市场交易行为和要素收入的税收征集，计划经济的税收不是针对这些方面，主要是征集国有企业的利润。第三，财政和中央银行，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他们不过是计划的被动执行者，现在变成主动的经济调节者。

回顾中国改革的轨迹，可以看出中国在持续地、不断地进行着这些制度建设。曾经有一种概括：宏观调控、市场监管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决定了我们在某一个方面的放开程度。这主要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的，概括大致准确。但制度建设并不都是国家主导的，还有市场发展需要和其自身产生的制度建设。因此，可能从“让市场配置资源，国家应该提供什么政策环境”这个角度表述会更完整一些。无论如何，那种概括还是清楚地表明，我们是一直把制度建设作为重点的。改革（reform或restructuring）本身就包含有制度建设的意思。我们曾经在这些方面有一些延误，或者说是有过一段比较薄弱的时期，比如1993年的通货膨胀，其起因很复杂，但是有两点我们可以看到，一是当时国家的财政能力很薄弱，二是并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能管住全社会总需求的中央银行。通过1993年和1994年的改革，我们比较整体性地补上了这一课，从一个漏洞比较多、很多情况下是基于对企业或经济行为进行直接控制的税收制度，转向了比较现代的、基于市场经济和自由经济决策之上的税收制度，而且国家的财政能力从此不断地提高。央行也进行了比较大的改革，真正开始脱离那些商业性行为，注重于货币的稳定。我们还改革了外汇制度，使之更加适合于货币政策调整、货币供求调节以及对外经济开放。我们还对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进行了改革，建立了市场经济条件之下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基础。有的国外学者对中国财政改革的效果有疑问，主要是观察到在改革以前的1978年，国家

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31%，现在降到了20%，财政能力没有增强，还十分薄弱。实际上，这不是同一个概念。当时的31%是把所有国有企业的利润、折旧，全部进入国家财政，是一种计划经济的财政概念。现在国有企业利润、折旧等全部由企业自己去决策，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税收。同时20%并不是一个可比的指标，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财政能力的概念，因为它不包括社会保障缴费，也不包括政府性基金，还不包括一些使用者付费。加上这些因素，中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概就会再提高，即政府控制公共资源占GDP的比重还会更大一些。从绝对量看，最近十几年来财政收入能力也是不断增强的，不到五年左右的时间财政收入大致就翻了一番，这是国家稳定的一个重要保证。最近几年我们一直在推动增值税转型和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将会有一定量的财政收入减少，这既是进一步完善让市场发挥作用的政策环境，也是一种自信的表现。

所有这些制度性变化，可以看到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各种理论和实践在中国都得到了应用，当然都不是全面照搬。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大幅度降低了信息成本，包括政府强制执行游戏规则所需要的信息，政府征集财政收入、维持政府能力的信息，还有市场自由决策的企业和个人所需的经济合同的信息等。我们已经从中央计划经济控制之下信息完全由政府提供，变成了主要从市场取得，而且有制度性的保证。

总之，简单地照抄照搬“华盛顿共识”是不对的，我们必须运用先进生产力所发展出来的那些经济理论的全部成果，这是我对经济改革作的一个简单概括。从实际结果看，这种改革带来了非常快的经济发展，近20年GDP增长平均在9%以上，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一个策略比较正确的改革使国民福利和人民实际利益不断提高，改革变成了发展的动力，也为自身开辟了道路。

### 三、几点比较

我对俄罗斯了解不多，2000年我第一次去俄罗斯访问，当时找了一些俄罗斯的报纸，看到正热烈讨论着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建立会计制度，另一个是如何建立税收制度。我看了这两篇文章后非常吃惊，俄罗斯还在沿用前

苏联的成本会计制度和基于国有企业上交利润的税收制度，而当时俄罗斯进行所谓大爆炸式的、休克疗法式的、套用华盛顿共识的改革已经将近十年了。我一看到这两篇文章，就想到这种改革出现灾难是必然的，因为这两项基本制度是经济秩序的重要保证，需要充分的准备。大爆炸式的改革，不可能、也没有完整的意识去考虑这类“次要”的条件，结果是计划经济的秩序被破坏了，市场经济又不能正常运行。尽管中国在这些方面也是薄弱的，但经过制度建设较早地补上了这一课。比如说会计制度，2000年的时候我们已经颁布《会计法》15年了，并且不断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最近还要发布新的会计准则，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和国际资产评估委员会认为中国会计准则是与国际趋同的，所剩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差距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而且对国际会计准则的确立非常有参考价值，对我们的审计准则也有类似的评价。税收制度的改革是永远都没有止境的，前面已讲过，我们也较早地建立起了基本制度。这是我作的一个简单比较。

我还记得1993年年初，到日本参加一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规划培训班，来自独联体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和财政同行们也参加了这个班，主要探讨市场经济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决策等内容。我发现他们突然明白了一点：他们的国家都在卢布区，所有这一切对他们来讲都没有制度基础。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对这些基本制度缺乏了解，更不要说重建了。

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最近一两年欧美特别是美国一直要求中国的汇率制度体现灵活性，要实现浮动汇率。既然我们要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那么在开放经济的情况下，必然要实行浮动汇率。问题是我们也并没有这方面的制度安排，而欧美是有的。我们长期以来实际上是固定汇率，企业根本就不知道如何规避汇率风险、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如何定价。因此，我们必须给出制度安排，还要通过培训让企业知道这一点。尽管市场本身也是一种培训，但主动建立这样的市场是最为关键的。经过充分准备，2005年的5月18日我们在银行间市场允许非金融企业进入交易，建立做市商制度，形成了浮动汇率制度之下的市场制度基础。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制度，企业不会在这一制度安排下规避汇率风险，汇率浮动又比较大的话，那将对企业经营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这与刚才讲到俄罗斯的情况是一样的道理。

我并不是说中国的转轨非常成功，也不是说我们没有毛病，实际上我们还



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说，地区间的差异问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不能非常有效和一致地执行法律、维护游戏规则问题。又比如说，我们的税收制度还不够公平，收入还过多地依赖工业生产环节，应当更多地市场交易活动中不干扰资源配置的同时增加政府的收入，以及使收入更多地来自生产要素的所得上。还有在金融风险、现代金融企业运作和金融制度等方面，我们都还有很多工作要去做。然而，总体上中国改革是成功的，这条路是基本正确的。中国为什么要走这条路，解释起来十分复杂，我简要归纳几点：

(一) 中国改革从整体上一直是市场导向的，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以及之后的理论，一直是指导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思想基础，而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最终确立，是从1992年中共十四大才开始的，因此必然形成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比较小心的，没有因为比较早地确立某一个目标而陶醉，也没有一下子建成某种目标形态的幻想，实际上也没有“天真”的条件。

(二) 中国在改革起点时的发展水平，远远没有前苏联经济发达，这时候建立一些比较简单的制度就可以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而在前苏联经济比较发达的情况下，建立新制度则要复杂得多，强度要很大。因此，对于前苏联的改革来说，如果不经历比较大的痛苦就实现平稳改革，难度比中国要大。

(三) 中国改革没有照抄别人，因为我们有历史教训，特别是中共曾经照搬共产国际指令、斯大林的指令，结果是几乎断送中国革命。后来我们一直讲求实事求是，吸收外来成功的经验和理论，根据中国特点寻找自己的道路，这是一贯的指导思想，一种深入骨髓的意识形态。

(四) 中国改革既然走出了这条路，而且从开始以来人民群众就不断获得好处，他们就认为它是正确的、就拥护，改革为自身开辟了道路，就可以接着走下去。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路径依赖。

至于俄罗斯改革思路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很难做出准确判断。但是，过去已成为历史，过去的路不能重走，今天的中国和俄罗斯都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也都面临一些问题。尽管很多问题不一定相同，但大家都会从各自和对方的经验、教训以及发展成就方面获得一些营养。比如最近几年俄罗斯的税收改革，我觉得就决心很大、效果也不错。我们都需要相互学习，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做出自己的贡献！